

回顾1955—1965年北京图书馆 主编的三个专业刊物

本刊特约评论员

《图书馆工作》(以下简称《工作》)、《图书馆学通讯》(以下简称《通讯》)、《图书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三个专业刊物。这三个图书馆学专业刊物是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发展和它所遇到的困难曲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与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前进与挫折息息相关的,也是与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的。在我们祖国遭到深重灾难的十年动乱期间,三个刊物的命运同许多图书馆工作者一样,被加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被诬蔑为“黑线专政的舆论工具”,被列为“砸烂”、“粉碎”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图书馆事业又跨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实践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发扬学术民主是我们事业发展和理论建设的根本保证。今天,当人们纪念北京图书馆开馆七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这三个刊物十年间所走过的道路,恢复三个刊物的本来面目,并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在今后工作中“慎思明辨”,有所借鉴,是十分必要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初步总结,对当前图书馆理论研究工作 and 专业刊物的编辑宣传工作有所启发。

一、三个刊物的十年经历

三个刊物创办最早之一是《工作》,创刊于一九五五年。前此,一些宣传图书馆事业方针政策,介绍图书馆工作经验,研究图

书馆学理论的文章,主要依靠一个综合性的刊物《文物参考资料》来发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这时仅依靠《文物参考资料》刊载的少量有关图书馆学的文章已不能满足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学习和理论探讨的要求,“科学地、系统地研究图书馆工作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推动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将《文物参考资料》的图书馆部分分出,单独出版,为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提供一个较为广阔的学习和理论探讨的园地,这样就诞生了《图书馆工作》。《工作》出版后,1955—1956两年为双月刊。1957年以后改为月刊,前后历时六年,共出版54期。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进一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加强图书馆的理论建设,一九五七年,在继续出版《工作》的同时,北京图书馆又编辑出版了《图书馆学通讯》。它与《工作》两者在内容和读者对象上有所分工,一个侧重于介绍图书馆工作先进经验,推广科学的工作方法;一个侧重于理论研究。

《通讯》1957—1958年为双月刊,1959年改为月刊,前后共出版30期。

1959年在全国刊物进行大调整中,两刊于1960年合并,更名为《图书馆》。《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文献学学术性季刊,历时四年,于文化大革命前夕被迫停刊,先后出版16期。

以上情况表明,三个刊物的起落兴革过程确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发展紧密相联,息息相关。1956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我国已经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同年一月，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制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这一时期的《工作》体现了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正确方向，在贯彻党的理论建设方针、政策方面较为稳妥。因而它在内容上比较丰富，形式也比较活泼。它介绍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经验，刊载了许多有益的文章、著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对研究和试验改革解放初期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落后面貌，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作》由于创刊伊始，经验不足，加之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它不免过分地强调了学习苏联的一面，誇大了他们某些个别经验或个别理论的作用。

1957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及其后的反右派斗争。接着，1958年又提出所谓“插红旗，拔白旗”的错误口号。这一来势迅猛的政治思潮，不可能不波及图书馆战线和它的专业刊物。这一时期的《工作》和《通讯》，本身曾受到过一些过火的不符实际的责难和批评，曾被迫作过多次自我“检查”。但与此同时，它也曾错误地发表过对某些作品、论著及其编、著者的一些过火的、不切实际、不科学的批判。这样就使得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工作出现了某些不正常的状况，挫伤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和研究与写作的热情。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作》和《通讯》也展开过很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的讨论、研究和经验介绍，如组织了关于大型图书馆分类法基本序列与标记符号的讨论，关于“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的讨论，以及编制联合目录的讨论，介绍了许多国内外“图书馆开架借阅”的经验，发表了一些中心图书馆、大型图书馆的“情况介绍”，积累了一些必要的图书馆学统计资料，等等。

1960年，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正

确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所遭受的损失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使国民经济得到了发展。创刊于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杂志，在认真贯彻党的“八字”方针，推动各级各类图书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中作了许多努力；与此同时，它积极提倡加强图书馆的基础工作和按图书馆的工作规律办事。胡耀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图书馆为农业服务的工作》，汪长炳：《对加强图书馆基础工作的建议和意见》以及管一丁：《整顿和健全规章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等文章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这时刊物还介绍了许多图书馆为生产建设、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它们为贯彻执行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正确方针、方向和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时，刊物也明显地开始在接受前一时期的教训，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先后开展了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图书馆分类法发展路向问题的讨论，以及图书馆员基本功问题和图书馆员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业务修养的研究和讨论。为加强专业刊物的思想性内容和表彰先进，《图书馆》编辑部曾专程采访报道了几个刻苦钻研业务，以宣传共产主义为己任的图书馆员典型，这在专业刊物联系实际，反映时代精神风貌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三个刊物发行量的增长情况：《工作》最初的印行数量是8,000册，后来提高到17,000册；《通讯》最初印行2,700册，后来最高发行量为8,500册；《图书馆》最初印行量是10,000册，到1964年最高发行量达到16,800册。这些数字表明，这三个刊物在当时图书馆三大系统中平均每馆订有8—10份（每10—12名工作人员一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重视。三刊发表的有些论文至今常被翻印，转载和引证。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献中心据以编辑了《中国出版图书馆关系资料一览》，石桥正子女士编的《中国图书馆关系杂志记事索引总目次》，不仅

收录了自1955——1964年三刊发表的全部文章,并把简化字改成日本目前所限用的汉字或旧体字,以便检阅。

总之,由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由于编者和作者的努力,由于广大读者的积极支持,从总的方面看,三个刊物在十年中,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上,在为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它们在我国和国外图书馆界产生过一些积极的影响。但是,三个刊物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这期间也曾受到“左”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出现过一些缺点和失误。但是这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党的正确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其主流是好的应予肯定。

二、三个刊物的资料价值和它们在理论建设、培养人材上所起的作用

三个刊物对于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所作的积极贡献,不仅表现于它们在当时所起的重要的宣传、教育、组织、交流、鼓舞和促进的作用,而且表现于它们在十年办刊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促进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专业人材和理论骨干。这三点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加强和不断完善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研究和总结我国图书馆事业史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下面我们分别对此加以阐述:

(一) 积累资料

首先,三刊记录了许多反映我国解放后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变化的有用资料。作为图书馆的专业刊物,三刊必然以它对社会“折光”的本能,留下我国图书馆事业在各个阶段发展的缩影,这是无须多论的。这里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刊载于《通讯》1959年10—12月号,和《图书馆》1964年第3期的两组文章。这两组文章,前者介绍了我国解放后十

年间图书馆飞速发展的状况;后者总结了建国后十五年间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如刘国钧先生等人撰写的《五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成就》,徐家麟等人撰写的《图书馆干部的培养和训练》,袁翰青撰写的《十五年来我国文献工作的蓬勃发展》以及其他文章,如《我国图书馆书目、联合目录、图书统一分编》、《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协作与协调作用》及《中国科学院系统和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成就》等,都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作者身历目睹或者经过调查研究的材料叙述和综合,评价了我国解放后图书馆事业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与上述文章可以互为印证的是,三刊在十年间,陆续介绍了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等几十个大型图书馆(包括中心图书馆)在建国十几年间发生的重要变化,它们更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解放后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崭新面貌。

第二,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史,研究我国图书馆事业史,特别是研究我国近代图书馆史分期问题,必然会接触到当年由我党亲自领导的一些进步图书馆的史料。这样的史料三刊先后刊载过多篇,它们是:

《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通信图书馆》、《继承和发扬“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革命传统》、《“康敏尼特图书馆”简介》、《抗日战争前后的蚂蚁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地区的图书馆事业概况》、《记诸暨西斗门民众图书馆》。

三刊同时也刊载了一些介绍我国古代和近代藏书楼的文章,如《天一阁的藏书和利用》、《论“古越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徐汇观书记》等,对系统地研究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同样是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第三,数字统计,是一些稍纵即逝的材料,对于一些有关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统计数

字,能够及时加以捕捉,适当地公布记录下来,这无论对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还是作为日后研究图书馆工作的参考,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三刊在有关报道、总结、评论中,从各个不同角度,翔实地记录了许多统计数字。如关于各类型图书馆发展的数字统计,对一馆或数馆藏书册数的统计,对图书流通率和拒绝率的统计,对干部队伍发展状况的统计资料,等等。时间过得越久远,就越显出这些数据的重要价值。

第四,在当时图书馆专业刊物尚少的情况下,三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当时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各个不同流派,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一些现在已经作古的图书馆界老前辈,如刘国钧、杜定友、赵万里、王重民、顾家杰等人的论文和著作;这些论著广泛地涉及到了图书馆学、图书分类学、图书著录和版本目录学等许多方面的理论。这是他们一生从事图书馆工作和从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成就和成果的一部分。这些论文和著作,通过刊物得以保存下来,对于丰富我国图书学理论宝库,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和考察当时学术的发展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五,十年中,三刊曾先后刊载了有关国内外图书馆事业的通讯、报道、简讯等达一千余条。它们的特点是文字简洁、反映及时、内容多样、材料具体。这些通讯,报道了我国国家、省、市图书馆的工作,并兼及很多地区、县基层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及高等学校图书馆系统的工作报道收入三刊的,总计约有150多个。此外,还报道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30多个国家,40多个著名图书馆的有关业务活动情况。它们都比较及时具体地反映了国内外图书馆界在各个时期的工作动向、学术水平,教育革新、馆舍建设和变迁以及国际间图书馆业务交流、图书馆法规制定、专业书刊的出版状况等等。这些小资料

虽是零金碎玉,但是它表明中外古今各科学术交流是历史的必然。如果加以系统地分析整理,将更有益于我们对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发展变革的研究。

三刊在十年办刊过程中,给我们留下来的资料是多方面的,它象一部图书馆事业发展史长编,具体地记录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国和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真实状况,使我们今天得以有一面历史的镜子来回顾我们事业的过去,得以在过去的基础上来研究和展望我们图书馆事业的未来。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细流不择方为海”(郭沫若语)。今天,我们从三刊所留下的大量的丰富多彩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正是它们在学术理论研究中“细大不捐”,“兼收并蓄”,把百川汇为洪流,归注于图书馆学术之海。它们的历史作用不没。

(二) 理论建设

我们党历来坚持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观点,历来重视在各条战线上进行理论建设。三刊创办伊始就明确宣称它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并且把加强理论建设,发展图书馆学术作为自己办刊的主要宗旨。

《工作》发刊词中就曾开宗明义地指出:“研究和探讨我国图书馆事业上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提高、发展我国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的保证”。三刊的十年实践证明,它是坚持了上述办刊宗旨的,经初步统计分析,从《工作》创刊到《图书馆》杂志谢别读者前后十年间,三刊共发表了专题学术论文380余篇。它们的内容深入论及到图书馆学、目录学、分类学、情报学等各个领域。它们所研究的问题归纳有:

- 1.图书馆学及其基础理论:包括藏书建设和目录编制68篇。

- 2.书刊的流通、阅览和读者工作(其中包括图书馆如何为科研生产、为政治思想工作服务以及开架阅览的研究)35篇。

- 3.分类法和目录研究43篇。

4.图书馆教育和专业干部培训(包括馆员基本功的讨论)20余篇。

5.图书馆史和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研究10余篇。

6.我国古代书目和目录学研究10余篇。

7.专业及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和研究10余篇。

此外,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介绍和论述了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和文摘索引工作。有的对图书馆网的建立和馆际协作工作,对图书馆学、版本学、文献情报工作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三刊在推动开展理论研究中,善于抓住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关键问题进行有重点有引导的讨论,力图发挥理论工作作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前导作用。比如在五十年代开展的关于图书分类法基本序列与标记符号问题的讨论,关于图书开架借阅问题的讨论;在六十年代开展的关于图书馆目录体系和主题目录在宣传图书中的地位 and 作用的讨论,目录学研究对象,以及图书馆员基本功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都是针对当时我国图书馆业务实践中存在的亟待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探讨,同时结合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趋势而提出的主要问题。这样就使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在与图书馆工作实际的结合上靠拢了一步,有助于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保持理论之树常青。

为了在理论建设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三刊在活跃办刊的民主空气方面,曾经先后做过很多的努力。1956年《工作》不但发表了许多读者的批评和建议,还主动征求读者对某些有影响的著作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如这一年第二期该刊在发表《在读者分类目录中更好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文以后,“编者的话”中即向读者提出:“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一步开展讨论”。在发表了刘国钧等人编写的《图书馆员基本业务知识讲话》以后,同样要求读者对“还有错

误或不完备的地方”,提出宝贵意见。这种主动进取,依靠群众办好刊物,搞好理论建设的方法和作风,是很可取的。

《图书馆学通讯》在创刊之始也声明:

“凡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有独立思考和见解的论著”,“只要抱着相互研讨的态度,阐明学术和追求真理”,“本刊对这些稿件都很欢迎”。《通讯》提出的这种办刊愿望和指导思想,到了六十年代《图书馆》杂志问世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员基本功”的讨论,问题的提出是由1961年发表张遵俭《业务学习札记三则》开始的。札记发表以后,各地读者纷纷来信表示了许多不同意见。编辑部掌握这一时机,善于提出选题,给予读者以争鸣的机会,从1962年第二期开始,特辟“基本功笔谈”专栏,先后发表了刘国钧、顾家杰等19位同志的文章和意见,报道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教研室、南京图书馆、广东图书馆学会筹备小组等单位座谈基本功问题的辑要。为推进讨论,编辑部以袁方署名发表了《从一束来稿中看基本功讨论问题的焦点》,把问题引向纵深,并以《图书馆工作者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业务修养》而告一段落。参加这次讨论的作者有多年从事图书馆专业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教授,也有普通的图书馆工作者,年轻的教师、助教。文章的观点,有的求同存异,有的力排众议,独树一帜。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体现了编辑部提倡学术民主和支持真知灼见的精神。这种讨论无疑对加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队伍建设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刊在理论建设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注重总结我国图书馆工作的实际经验,从而,使理论建设工作在“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过程中得到提高和发展。

建国以后的十五年间,随着我国图书馆事业不断发展和图书馆业务的深入开展,广

大图书馆工作者积累了许多适合我国国情的办馆经验。这些经验的交流园地,当时主要是通过三刊登载的文章正式推广传播的。三刊在它刊行的十年间共刊载各种经验、体会文章540余篇。现在我们重新披阅三刊,可以明显的感到,这些经验,不仅对当时推动我国图书馆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建设和发展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经验,尽管由于时间的推移,已经显出了它们的局限性,但是,其中有许多具有揭示客观规律的,符合建设现代化图书馆需要的东西仍然是值得我们今天郑重地学习继承、发展或参考借鉴的。特别是三刊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为根据,同时注重研究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发展趋向,紧密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又比如关于图书馆为生产和科研服务的经验,加强图书馆基础工作,注重基础工作手段标准化、规范化的探索,关于作好参考咨询工作和有条件的实行开展借阅的经验,以及开展图书馆教育和培训专业干部的经验,等等,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十分珍视的。

由于这许多艰巨的理论建设和资料的积累,在《图书馆》季刊行世期间,已经显示出六十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目录学及其他各项研究课题,在借鉴前人理论遗产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它同我国解放前图书馆学理论遗产相比较,已显得丰富得多,深刻得多,系统得多了;同国外各种图书馆学派理论相比较,也已明显地表现出它开始在确立自己的具有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特徵的独立体系。这种理论建设工作,不仅推动了当时图书馆业务工作,也为后来编制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制综合性汉语主题词表,以及编制全国古籍善本书目这些卷帙浩繁的巨大工程,作了某些必要的有益的理

论准备。

(三) 培养人材

注意人材的培养是同加强理论建设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理论建设工作的开展可以锻炼人材,发现人材;另方面只有人材的不断地涌现,不断地得到培养,才能使理论建设工作后继有人,传好科学研究工作的接力棒。

三刊在十年办刊过程中,在培养人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培养专业队伍。据1964年统计,当时我国干部队伍的发展,仅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公共图书馆的人数,就相当于旧中国1939年全国所有图书馆专业工作人员的总数,接近于1952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干部总数。在当时数以万计的专业干部队伍中,先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的不过千人,加上其它接受研修班、训练班、函授班、业余学校教育和培训的不过几千人。他们同整个队伍比起来,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图书馆专业干部,还是通过在职的业余自学成长,成为业务骨干,或者能以胜任图书馆某一方面工作的人材;而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自学的重要教材和参考资料,主要就是当时的三个专业刊物。前面关于三个刊物发行数量的统计说明,它们在十年中,业已成为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提高自己,扩大业务知识的经常性读物或通用教材。三刊在十年办刊过程中实际也在着力把提高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业务水平视为己任,它们本着提高与普及兼顾的精神,不断及时地介绍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和各种基本知识。

1955年第2期《图书馆工作》创刊伊始即声明:“本刊经常接到各地读者来信,要求解答各种业务问题,我们认为带有普通性的问题提出大家讨论,对工作是有帮助的。因此从本期起特辟“问题讨论”专栏,希望同志们热烈参加讨论”(编后记)。

1956年《工作》第二、第四、第五、第

六各期,连续刊载刘国钧等人著的《图书馆员基本业务知识讲话》。

1957年《工作》又发表“业务知识”文章11篇,“问题讨论”文章15篇,“业务解答”18题。

从上述三年的三组选题,足以说明《图书馆工作》等三刊当时实际上已成为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提高业务能力的“不开口的老师”、不讲课的“学校”。这个学校“树人”之功是无形的,但对许多人是终身难忘的。

第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理论骨干。当时在三刊上发表文章的大量的不知名作者,有的是普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有的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因此,对待这部分作者,以及对待他们的作品态度正确与否,是关系到刊物能否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壮大理论队伍的根本性问题。三刊本着不以人取稿,不以人舍稿的原则,热情为一些当时虽不知名,但有一定基础,有一定可取之处的作者开“绿灯”,为之提供了种种方便条件,包括重大的加工修改。喜看许多当年勤于钻研,努力写作的中青年作者,今天已成为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的业务或理论骨干,“十年树人”结出丰硕之果,应是我们同引为慰的。

现据《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两刊统计,见刊的个人作者前后共361名,其中知名的专家、教授、学者占8%,原来不知名的作者占92%。两刊共发表作品(译文除外)708篇,其中集体著者的论著约占28%,不知名的著者的论著占60%,知名的专家、学者的论著占总篇次的12%。以上两个统计数字说明,三刊在联系广大作者,“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断在为壮大与建设本专业理论队伍和培养新秀方面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的。

三、三刊所引出的教训

三个刊物在不平凡的十年中,遵循党的

办刊方针,同时由于编辑、印刷和发行部门的共同努力,由于作者、读者、图书馆界以及其他各有关方面的热心帮助和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理论建设工作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是我们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但是,作为反映我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三刊也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历史的进步,三刊在当时所表现出的缺点和失误,今天已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回顾三刊时须特别加以剖析并引以为戒的。

三刊在十年中究竟有哪些缺点和失误,从中引出什么样的教训,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十年中,三刊介绍了很多苏联图书馆的工作经验和理论著述,其中有关于介绍列宁论图书馆及与图书馆工作有关的论著,这些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资料价值,这在当时和今后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但是,当时三刊把对苏联图书馆界的个别工作经验和个别理论著作宣传到不适当的程度,过分夸大它们的意义和作用,这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值得提出的是,对于这种错误的影响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危害还远未能清除。建国初期,当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还很缓慢,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适当地介绍国外现代图书馆的经验,这正如我们今天仍然在注意介绍国外图书馆的经验一样,原是不可厚非的。但我们不能没有选择,认为别人的什么都好,用别人的经验代替自己的经验。别国的经验,只能结合我们的国情、馆情供作参考和借鉴。这里,重要的还是在于对国情、馆情的研究,使其为我所用。否则,如果仍沿用过去的旧法,照抄照搬,那我们就将永远摆脱不了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了。

第二、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以及后来“拔白旗”运动的影响,三刊曾在一个时期内发表过对某些作品、论著以及对它们的著者、编者的过火的或不适当的批判文章。这些文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本来是人民内部的意见分歧,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反动”,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的论争硬拉到“两条道路斗争”上来。如1958年发表的《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什么是图书馆学〉》、《批判杜定友先生图书馆学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批判皮高品先生和徐家麟先生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1959年发表的《〈图书馆学辞典〉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株毒草》等等,这些批判文章都明显地、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图书馆学理论战线上受到的“左”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它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工作产生过十分不良的影响,挫伤了图书馆专业作品、论著和其它出版物的繁荣发展。这个沉痛的教训是我们今天应该特别自觉地记取的。对于作品和论著中的重大缺点和错误,对刊物内容和编辑工作中重大的缺点和错误,读者和刊物编辑部门都可以提出意见和

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首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或技术方法问题。对于那些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学术观点、专业思想和技术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应允许个人保持不同的看法,允许改正缺点和错误,允许摆事实、讲道理的民主讨论,这样才利于促进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和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总之,现在回过头来,重新看看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这三个刊物创办的艰苦历程,给人总的印象是:它们在建国后十七年中,是作为党领导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种宣传工具而出现的。因此,它们在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就必然要随着党的事业前进的脚步;有胜利进军,也有蹉跎迂迴;有成绩,也有缺点和不足。它们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中某些重要侧面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留影,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上的一部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录。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的新作。但是,对作为社会文化和思想交流链条上的图书馆历程的回顾是有益于未来的。

